

略谈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 及其科学思想传播*

王生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王兴东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摘要 本文回顾了我院历史上“自在”的科学思想库功能并借鉴国外现代思想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最后对我院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

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目标之一。

何为国家科学思想库,应发挥怎样的功能,其研究运作与一般科研有何不同,它的成功建设需要哪些基本条件。这些都是我院在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从回顾我院历史上“自在”的科学思想库功能并借鉴国外现代思想库建设的成功经验,拟对上述基本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1 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的现时意义

思想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现代社会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这种变化,让决策特别是高层重大问题的决策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其表现为:决策的领域日益扩大,已从传统的内政、外交、军事扩展到经济、科技、教育、

文化、人口、资源、太空、生态环境等许多新领域;决策的内容日益复杂,已由单一目标决策发展到多目标决策,由单项决策发展到多学科、跨领域、超国界的综合性决策;决策的数量不断增多;决策的方式已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转变;决策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风险逐步加大;决策的速度和频率加快,要求决策者和决策机关迅速做出反应。在这种日益变化的新情况面前,高层决策者或决策机构,在做重大决策时,仅靠一个人或少数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阅读所有的原始文献、研究全部的第一手资料、熟悉该决策所需的一切必备知识,并提出该决策的基本指导思想等等。所以,进行重大决策时,如果没有一批熟悉相关领域的专门人才为之搜集、整理、分析各种必要的信息资料,提供所需的基本知识,推荐可供选择的决策思路等等,决策者或决策机构则很难做出正确的抉择。实践证明,现代社会再也不可能仅凭决策者个人

* 收稿日期:2006年4月23日

“英明”或决策机构的已有“经验”即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由于这种日益增大的社会需求的存在，为弥补决策者和决策机构在精力、智力和能力等方面的不足，被人们称之为“思想库”的研究机构便在世界各国陆续应运而生。

2 我院历史上的“科学思想库”功能

智囊之类的人物，在中国自古就有。凡我国古代的成功政治家，观其身后无不有成批的“幕僚”、“幕府”或“师爷”。在新中国建设史上，也一直有类似“思想库”的组织、群体或个人，特别是中科院一批杰出科学家满怀报国之情、不断主动向国家最高决策层荐言献策，其对我国科学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举国公认。例如：

1955年，一批学部委员向国家提出了应尽快制订全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并最终促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该规划的实施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国防和科学事业的快速发展并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科技史上一座重要里程碑；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院士等站在国家安全及发展的高度，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该建议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从此，我国加速了“两弹一星”的研制，迅速缩小了和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

1981年5月，谢希德等89位院士联名写信给中央领导，建议在我国实行科学基金制。198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会，之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制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稳定发展；

1986年3月3日，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4位院士联名向党中央提出跟

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加速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随之制定并组织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863”计划对促进国家经济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92年9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6位院士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经国务院批准，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的建立为促进国家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学部的职能自1984年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后，向各级决策层提交了一批卓有见地的咨询报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应特别提到的是，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开展，正是由于我院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报告，而中央依此报告而做出英明决策的结果；……

上述例证足以说明我院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对高层决策确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我院的一些组织、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某些思想库的功能。但就大多数行为主体的行为过程和依其“思想产品”形成政策所必须的多种可供选择的系统配套方案来看，其运作成熟度还没有完全跨入现代思想库的行列。上述例证中的相当部分仍属非组织状态下科学家的个人行为，其难免带有偶发性；即便是组织行为的某些“报告”的形成，也往往难以跳出沿袭“科研课题”的“文人”研究模式，而对决策层的决策运作和政策形成过程知之不多，故多是给领导层普及知识而较少能形成重大决策。因此，即使承认我院以往确实起到了某些思想库的功能，也只是在个别点上闪光，而与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

在满足国家总体需求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鉴于此,让我们考察一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现代思想库的成功经验,对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或许能有某些启示或借鉴作用。

3 国外现代思想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思想库与古代及近代社会的同类机构已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是由现代社会决策行为日益复杂化和发展的民主程度所决定的。

在当代科学文献中,思想库又被称为智库、智库、智囊团。思想库一词,最初由美国人开始使用,是个纯军事术语,类似作战参谋部。二战结束后,该词沿袭用于军事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部,其中最著名的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研究发展部,20世纪50年代,该部成为独立实体,但仍然以研究与发展为名,将两个英文单词复合即RAND,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兰德公司。以后,其它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也陆续有了这类机构。所以,所谓思想库,就是指像美国的兰德公司、德国的艾伯特基金会、日本的三菱综合研究所等政策研究机构而言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谓思想库广义上是指那些参与公共政策分析或研究的各种机构。它们通过研究咨询活动,为政党、政府、企业或社会团体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3.1 思想库的性质

3.1.1 非盈利性

思想库一般为非盈利性的独立法人实体,其根本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的咨询服务。思想库成功与否主要以其所提供的咨询研究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而非获得的利润。思想库的财务政策是收支平衡,其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捐助、被服务单位提供的合同经费和向社会提供有偿研究成果。

3.1.2 超脱性

非营利性思想库无股东、无政府主管部

门,其决策机构为代表公众利益的理事会。这样,就使思想库具有了一种颇为超脱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可使思想库获得许多独特的好处:(1)既可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但又不成为其附属物,有效避免了政府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从而保持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2)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不是像大学一样的纯学术研究机构,但又能与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使它的科研人员能在一个类似于大学的“学术自由”环境中比较自由、独立地研究重大现实问题。(3)没有股东对它的赢利压力,因而能够实现完全自主管理,使它能够关注并研究那些赢利机构不关心的、潜在的、公益性的重大问题,或因某些原因被政府遗忘、不便出面及有意回避的问题。

3.2 思想库的功能

思想库对决策层及相关政策的形成发挥着多方面作用,其主要功能有如下4项:

3.2.1 生产政策思想

思想库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有时虽然短期内未必可行,但会逐渐为决策人所接受,以至最终立法成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领导者曾言:思想库对下一届政府的影响大于现政府。思想库一般是采取长期反复地倡导某种思想主张,以期瓜熟蒂落,成为政策或获得立法。

3.2.2 提供政策方案

思想库因其规模不同而研究范围差别很大。有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无所不及,因而能够对公共政策提出全面的新看法;有的则只专注于某个特定方面。不管怎样他们一般都是在总统就任之前或之初,以出书的方式公布本思想库的研究成果,意在施政产生影响。例如:1980年传统基金会推出的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成为里根政府官员的手册,在80

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胡佛研究所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末分别撰写了《80 年代的美国》和《90 年代的美国》两部长卷，阐述了可供美国选择的内外政策主张；进步政策研究所曾在 90 年代初为克林顿政府设计了《变革方案》。久而久之，每逢总统换届，主要思想库特别是与当政者思想倾向一致的智囊组织，无不为新任总统编写长卷，献计献策，从而成为惯例。

不过，多数思想库的大多数产品是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书籍或报告。例如：美国知名的思想库大西洋理事会在 80 年代初发表过颇有影响的《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传统基金会等常对具体的立法事项编写简要分析，提交给相关的国会议员及其工作班子；历来注重和擅长生产中长期、较具学术性研究成果的布鲁金斯研究所近年也开始重视反应迅捷的出版物。

3.2.3 储备和提供人才

长期以来思想库还兼有为政府储备人才的功能。美国的官员体制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总统 4 年一选，牵涉官员达 3 000 人之多。这些官员离开政府后，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各大思想库，调养生息，待机东山再起。各思想库也乐于聘用这些前政府官员，因为思想库很需要他们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并期待他们有重新进入政府的机会，以为思想库影响政府的决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传统基金会就很留意行政与立法部门的空缺，甚至将其建成资料库，并力争把基金会或与该会接近的人安插在这些职位上，以使该基金会的思想能最大限度地影响政府。

3.2.4 教育公职人员和公众

思想库还赋予自身教育社会和公职人员的责任。例如：传统基金会曾借共和党 1994 年重掌国会之机，开始为新当选议员举办情况介绍会，以使其能尽快熟悉新岗

位、进入新角色；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设有类似项目，帮助行政当局新上任的官员顺利地进入角色；布鲁金斯研究所专门设有公共政策教育中心，举办多种专题研讨班，为公共和私人部门的领导者提供研讨、进修的机会。上述教育公职人员的培训，以往都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等著名大学承办，但由于思想库的高水平、超脱性和成熟的运作机制已夺去了不少曾是名牌大学占领的市场。

3.3 思想库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思想库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的研究者必须具有独特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3.3.1 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思想库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国际公认的一流思想库之所以受到重视，就是因其能基于深厚的学科积累并通过卓越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出货真价实的新思想。比如，美国著名思想库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会的研究者，不但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相当多的人还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实际经验，并始终注意与各界人士保持尽可能密切的联系以保证社会调查的高效性。20 世纪 70 年代其下属的“国际实地调查中心”在亚洲曾搞过两项重要调查，其中之一是关于中国近海石油资源状况的调查，发表了《中国近海石油资源会引起国际冲突吗？》的调查报告，其对美国政府重新研究中美关系、调整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

3.3.2 独立思考

社会实践告诉我们，人只有处在独立、自由的思考状态下，才能产生新思想；一个机构必须是独立、自由地进行研究，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这也正是思想库的价值之所在。思想库虽然都有服务对象，但就研究工作本身而言，其不是某种权力的附属物。敢讲真话应是思想库独立思考的重要体现，正如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查尔

斯·沃尔夫所说：“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思想库，必须要讲真话，即便这个真话对客户不利。如果客户很成熟，他们会重视思想库站在客户长远利益的这种研究结果。如果所做的研究结果每次都是客户想要的，那么长此以往就将失去研究的可信度。”

3.4 思想库成果的传播机制

思想库要想扩大知名度，发挥其影响力，必须要有一套高效的成果传播机制。各思想库因其拥有的资源不同，往往各展其能，但主要方式不外以下几种：

3.4.1 发行出版物

发行出版物是思想库扩大影响的主要方式。思想库的出版物又有多种类别：(1)期刊。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布鲁金斯评论》等，都颇有影响。(2)书籍。其中有个人的著述，也有集体的著述，后者往往是为期数年研究项目的最终结果。(3)研究报告。通常将重大、紧迫性政策性问题的研究结果写成报告广为传播，当然首先是对政府及其官员施加影响。(4)快报。以比较快捷的手段就当前重要政策问题发表本思想库的见解，引导公众和舆论。(5)年度报告。总结和展示一年来本思想库各方面的工作、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等。也有两年发布一次的。

3.4.2 召开讨论会

每个思想库都无一例外地举办有各界人士参与的各种研讨会、纪念会等。这些活动既宣传本机构的政策主张，同时也吸纳与会者的聪明才智形成主导性意见和建议，然后发表会议报告，有的还进一步出版图书。

3.4.3 与媒体建立联系

通过媒体发表观点和评论是思想库发挥影响力极重要的一条途径。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保守派智囊感到在大众传媒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言机会，企业研究所在主

席比尔·巴鲁迪的领导下开始策划通过媒体向公众推销他们的思想。巴鲁迪开创了关于政策问题的电视评论和报刊专栏。一些思想库的研究者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发表评论，或在电视上频频露面，有的还成为报纸的专栏作者。思想倾向相近的思想库和媒体有的还形成了机制化的网络。传统基金会与《华盛顿时报》关系密切，前者的活动和观点常常得到后者的报道，前者反过来又把有关报道广为散发，加以宣传。

3.4.4 做国会的工作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传统基金会，该会专门设有负责国会关系的部门，其与议员及议员的工作班子关系密切，通过协助制订议案等来发挥影响，实现保守派的目标。传统基金会多年来所要求进行的变革在第104届国会通过的议案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4 对我院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的几点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院历史上科学思想库功能的回顾和国外成功思想库建设经验的考察，我们已能大体看出二者的差距。虽然国情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模式，但其某些成功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鉴于此，试对我院“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提出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4.1 决策机制改革是我国思想库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思想库的生存必须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为土壤，如果权利机构不将咨询制列入决策程序并建立决策失误问责制，那么政策研究的实际效果则甚微，所谓“思想库”也就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因此，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必须首先呼吁国家决策机制的改革。否则，决策者失误的责任风险如此之小，造成巨大决策性损失的“三拍工程”（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仍将屡禁不止。

4.2 “四专”，思想库建设的必由之路

我院虽被定位为国家科学思想库，但在“自在”状态下，顶多只是“武库”中的高质量散件，只有在“组织”状态下，并站在战略高度进行系统整合和研究，从“库”中输出的才是更有战斗力的武器。另外，我们不应只满足于我院现有积累能提供什么，更应该知道国家的总体发展需要我们提供什么。鉴于此，我院“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特别是核心人员）应逐步向“专职、专业、专款、专门机构”的“四专”道路。

4.2.1 专职

广义上讲，我院的数万名科技人员都可参与科学思想库工作，但非专职则无专责，都可做但未必都能做，即便是以咨询为主要功能的学部亦如此。因思想库的研究运作机制究竟不同于一般科研，不是有了学科积累就一定做出影响决策层的思想产品。思想库的研究工作必须充分了解政府（企业）及社会的需求，必须熟悉领导层的决策运作，必须懂得某类咨询任务需要组织哪些学科的专家共同研究，必须知晓各类思想产品作用于社会特别是作用于决策层的有效传播途径。凡此，非专职付出专门时间与精力难达此层次。有了专职负专责（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专门机构）才能有效组织全院科技力量真正成为科学思想库的宝贵资源，亦因此可使思想库建设由“虚”向“实”迈进一大步。

4.2.2 专业

专职或参与思想库研究者，仅凭原有自然科学知识则远远不够，必须补充政策科学、决策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交叉科学知识才能胜任思想库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特别是专职核心人员更应具备这一基本素质。

4.2.3 专款

除委托咨询与合同项目外，在起步阶段无一定强度社会资助情况下，院应从年度总

经费中划出一定额度，对“主动咨询”项目给予专款支持，以培育科学思想库不断发展壮大，扶植其最终走上良性循环。

4.2.4 专门机构

其是专职或参与者工作的平台。建议前不久建立的院战略研究平台及战略研究中心不仅包括文件（科发规字[2005]358号）中列属的3个研究中心，也应将我院先期成立的国情研究中心、现代化研究中心和近期成立的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以及我院其它与宏观发展战略相关的研究组织纳入其内，使之真正成为整合全院资源、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的院级协调机构和研究基地。另外，我们对院机关调精兵强将组建的规划战略局在我院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中的作用抱有极大期望，希望在它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使我院已有基础在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过程中发挥出更高的效率和效用。

4.3 联合社会科学家共建“国家科学思想库”

学科交叉与科学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其在思想库承担的研究中就更为突出，特别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可以说，涉及国家重大政策和决策的咨询项目，若缺少社会科学的支撑，研究工作则很难形成供决策层备选的完整方案。所以，“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必须要有社会科学家的参与。若设想再大胆些，无论从科学自身发展还是“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来看，以某种可行方式在新形势下重新整合中科院与中国社科院的科研资源未必不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选项”。

4.4 吸纳决策层官员以研究者身份进入研究过程

思想库成果的最主要服务对象是决策层，吸纳政府及企业部分现任或前任官员以研究者身份进入相关研究过程，其对了解决策层的需求、密切供需关系和疏通成果送达

渠道都将会起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院也应有计划输送部分战略科学家到政府或企业的关键岗位任职,一方面传播科学民主的决策理念,另一方面也可在决策岗位反过来支持我院科学思想库的发展。

4.5 “主动咨询”选题应列入院士大会和院工作会议议程,以代表提案方式遴选产生

由我院牵头完成并向中央提交的咨询报告,应是具有极高显示度和宣传效应的工作。很显然,随着报告的呈送,也就同时向最高决策层送去了中国科学院的水平和形象。因此,我们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以确保提交的报告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精品”。选题(指“主动咨询”选题)是咨询的最基础性工作,它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咨询的效果。可否考虑像人大、政协的提案一样,将征求选题列入学部大会、院士大会乃至院工作会议的正式议程,并进行充分论证,以确保其能有较强的针对性、预见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在选题层面就牢牢把握“国家科学思想库”的高起点。

4.6 重视传播功能,努力将《中国科学院院刊》办成国家科学思想库的核心媒体

任何思想库都十分重视其思想的传播,否则,再好的思想也只能藏于库中而不能发挥效用。除通过已有方式继续保持与社会和决策层的密切联系外,建议我院应重点支持《中国科学院院刊》,大力加强该刊与思想库相关的栏目建设,努力使之成为“国家科学思想库”的核心媒体,成为我国在战略与决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期刊,成为高层管理决策者的必读之物。

主要参考文献

- 1 汪廷炯.论思想库.中国软科学,1997(2).
- 2 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软科学,1999(6).
- 3 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作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0(7).
- 4 吕虹.加强思想库、智囊团建设 提高科学执政能力.天津日报,2005年3月28日.
- 5 宋惠昌.现代社会思想库:性质、价值和方法.天津日报,2005年3月29日.

On Construction of State Science Think Tank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ce

Wang Shenglen

Wang Xingdong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AS,100039 Beijing) (Institute of Police and Management, CAS, 100080 Beijing)

This paper reviews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s the state science think tank in history and good experience of state science think tanks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paper discusses some basic issues on building the state science think tank and proposes some advice to building the Chinese state science think tank at the CAS.

Keywords state science think tank, capacity building

王生林 男,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信息处、宣传联络处处长。1966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大荔县。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现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研究生。长期从事科技信息和宣传工作,曾多次参与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相关文件的起草,在报刊发表文章10余篇。